前　言

近年来，由广东省发起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已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成为吸引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热点。无疑，我是被这一热点所吸引者之一。

我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诚如郑群同志所概括的重大意义，而且也和我历来的研究志趣暗合。

记得10多年前我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所写的第一篇习作，便是载在《研究生学刊）上的那篇《孙中山与人民群众论略》。此后，我也多注意孙中山与方方面面关系的研究。今天看来，我过去的那些研究，其实都没有超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范畴，只是当时我尚未上升到民族凝聚力的高度去认识问题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已。

我选择以“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为题写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我认定无论如何估价，这个题目都应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的典型个案。

在我国，古往今来，杰出的政治家之于民族的凝聚，总是居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孙中山以前，出现过旋乾转坤的秦皇汉武、雄才大略的唐宗宋祖，然而，就心系民族、和合民族、追求民族的生存、解放、发展和繁荣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均不可与孙中山争辉比肩。

确切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才渐次认清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才有了近代的民族觉醒和近代的民族意识。因而，研究近代中国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显然有助于认识中华民族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自身凝聚力的演进动向。

中华民族在上一次跨世纪的过程中，虽有了来之不易的近代民族意识，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一盘散沙”似的离散状态，这就决定了孙中山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将中华民族凝为一体，不可能不与形形色色的离散力作不疲倦的斗争。这也清楚地启示我们，增强凝聚力和迎击离散力，是我们中华民族须臾不可偏废的两大方面。

孙中山是他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他之所以能获得民族的拥戴，是因为他真诚地反映了民族“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两大要求，代表了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根本利益。在救亡图存的任务业已完成的今天，对于走向世界、放眼未来、志在再造辉煌的中华民族而言，“振兴中华”四字，已经并将继续释放出使之愈益凝聚的巨大功能。据此，我们不能不称道孙中山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鉴于这些

认识，我对这个题目的科学性和价值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我在撰写本书时也不是没有顾虑的。首先，在孙中山研究领域，早已经过许多名家高手精耕细作，我恐怕不能提出多少能自圆其说的新见解。其次，对有关民族凝聚力的理论我也知之无多，加之功力不逮，恐怕也难勾勒清楚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二者关系的轮廓。我要深切地感谢陈锡祺、张磊、陈胜粦、林家有、邱捷诸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感谢黄球先生的慷慨赞助，否则，我难以鼓起勇气完成写作任务，也难以如期将拙著付梓出版。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尚祈识者不吝教正。

谨以本书纪念凝聚中华民族的典范——孙中山先生。

陈剑安

1997 年 8 月于广州

第一章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与中华民族的“聚”、“散”格局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是个极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早在鸦片战争前的上下数千年，她就以文明古国主人的雄姿屹立在东方，以“四大发明”母亲的风貌而备受世界景仰。正是在灿烂的中华文化长期滋养下，中华各族人民互为交融，愈益凝合，从而使中华民族获得了卓然不凡的超强凝聚力。然而，降及近代，时移势易，好景不再。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竞相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既是空前、也是跨世纪的灾难，民族凝聚力也遭遇到民族离散力恶性膨胀的空前严重挑战。作为致力于振兴中华的跨世纪伟人孙中山，他必须直面这样严峻的国情。

第一节　帝国主义“离散”中华民族的罪行

一、鸦片战争与中华民族传统‘凝聚’格局的变化

1840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远涉重洋，率先侵华。由此，中国开始步入了痛苦的近代旅程。此后至孙中山诞生前夕，时间不过 20 余年，其他列强竞相效法，汹涌而至，使原先独立自主的泱泱大国，迅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逐渐沦为列强群起瓜分的对象。在这种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况下，传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势不可免地要遭到侵略势力的冲击。

这期间，列强们依仗“坚船利炮”，挑起了两次鸦片战争，并且都获得了海盗式的胜利。他们那些可耻的胜利，被明白无误地记录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不平等条约，正是他们冲击中华民族凝聚力、诱发中华民族离散力的罪证。

以往，我们在清算列强侵华罪行时，通常注重就条约的各别款项，分门别类地归纳列强的劣迹。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仅仅如此，似嫌不足。如果我们忽略从民族凝聚力的视角来审视那些不平等条约，便不能更清楚地认清列强的丑恶嘴脸。无论进行逻辑推导或者着手心理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殖民主义者本能地指望被掠夺对象是松散的民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否则，就要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来破坏被掠夺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因为，被掠夺民族越是涣散，就越有利于他们夺得所谓的“胜利果实”。

我们不妨对孙中山诞生前出现的不平等条约，作一番约略的检视。虽然，其中的条款分涉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但是，方方面面都程度不等地侵蚀着中华民族凝聚力。

撮要而言，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如下数端：

其一，英国割占广东的香港、九龙司为其领地；沙俄将中国东北和西北共约 144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占为己有。这样，被割占地区的广大群众，被迫陷入异族治下，他们虽然不乏去国怀乡之心，但毕竟不能如前在统一的国家中与世代交融的兄弟民族紧密地凝聚一体。

其二，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向中国索得了鸦片烟赔偿费 600万银元、商欠 300 万银元、军费 1200 万银元 英、法两国通过《北京条约》，又合共向中国索得了军费 1600 万两白银，另有所谓恤金 70 万两白银。经济基础是民族凝聚的必要条件，殖民主义者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无论如何估计，都具有破坏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性质。其他如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涉及经济的条款，也无不动摇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

其三，法国通过《黄埔条约》，取得了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特权，不久，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 100 多年以来对天主教的禁令；通过《北京条约》，法国传教士还获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① 根据片面最惠国的条款，其他殖民主义国家自然获得了同样的特权。由此，产生了西方传教士大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88 页。

举来华的局面。尽管他们中也有一些人虔诚地在华传播宗教“福音”，热心地介绍西方的科学文明，但是大多数却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他们不仅进行破坏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基础的活动，有的还与地主恶霸相勾结，招徕地痞流氓。这些歹徒一经入会，便在教会势力庇护下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种种妄为，几难尽述。’[①] 所以说殖民主义者从文化侵略入手，进而直接破坏中华民族传统的凝聚秩序，丝毫没有过分之处。

其四，《南京条约》规定，凡是为英国的侵华活动效劳出力的汉奸、卖国贼、买办，清政府必须‘全然免罪”，已被监禁者，也必须全部“加恩释放”。这种条款旨在鼓励那些中华民族内部的败类，使之无所顾忌、死心塌地去充当殖民主义者的走狗，既反映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暴露了他们诱发、保护和助长存在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离散力的险恶用心。

这些条约，虽然没有直接扼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专项条文，但这只是因为殖民主义者认为，在取得侵华权益的同时，尚需尽可能地掩饰自己的狰狞面目，以便中华民族在昏睡或半昏睡状态中，无可奈何地去接受渐次离散的事实。这正是殖民主义者的老谋深算之处。他们和许多入室打劫的盗匪一样，作案之后总要尽可能地将自己装扮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殖民主义者的巧取豪夺，毕竟不能掩盖他们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空前灾难。战前，中国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战后，清政府虽仍然统治中国，但中国的领土、领海、关税、司法等主权开始遭到破坏。战前，

①范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6 页。

中国是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殖民主义列强对华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逐渐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战前，中华民族内部虽存在着若干妨碍民族凝聚的因素，但尚未与外来势力呼应结合；战后，殖民主义列强从扶持买办、汉奸入手，开始采取“以华散华”、“以华制华”的策略，等等。所有这些，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被迫陷入了畸形、病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逆境，也反映了殖民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动摇中华民族凝聚力基础的动向，反映了他们企图消饵中华民族凝聚力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用心。因此，富于凝聚力和反侵略传统的中华民族，尽管一时还未达到认清殖民主义者离散中华民族的理性高度，还未找到迎击侵略者的新型理论武器和斗争武器，仍必然要以传统的方式聚集力量，向侵略者进行抗争。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前后，中国各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是生动的例证。其中，被殖民主义列强首先破门而入的广东省表现得尤其突出，而广州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和广州的“反入城”斗争，更是鲜明地打下了民众凝聚、共御外侮的烙印。

1841 年 5 月 27 日，清政府派驻广州的皇侄、靖逆将军奕山，因战败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广州和约》，允诺清军在 6 天内退出广州城 60 里，7 天内缴纳“赎城费” 600 万元，赔偿英国商馆损失等。这引起了广州人民的强烈不满。 29 日，英军到三元里一带污辱妇女，肆行骚扰，更激起了乡民的愤恨。30 日，三元里及附近合共 103 乡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围攻英军盘踞的越秀山四方炮台，并将敌诱至城北牛栏冈一带加以聚歼，毙伤侵略军多人。他们利用锄头、扁担，大败武装到牙齿

的强盗，使之暴露了纸老虎的虚弱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斗争的人员，既以农民群众为主，又有手工业工人、渔民等其他劳动群众，以及萧岗举人何玉成等爱国士绅。他们跨越地区、行业甚至阶级界限，凝聚成一体，共同抗敌，这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内聚伟力再现的缩影。这次斗争，不仅是此后中华民族凝聚御敌的先声，也大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克敌制胜的自信心。正因为此，何玉成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万民皆同心,集众惟一呼,以此慑远夷,不战胆亦虚。”①

广州的“反入城”斗争从 1842 年开始，到 1849 年告一段落，前后达 8 年之久。事件导源于《南京条约》。该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按照清朝的陈例，外国人是不可进入中国城市的，所以五口通商并无清政府允许英国人开进这些城市的含义。但是，英国侵略者曲解条约，强词夺理，企图强行进入五处城市，以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广州离香港近在咫尺，素有中国南大门之称，因而英国侵略者在强取香港之后，就把开入广州作为志在必得的目标。所以《南京条约》墨迹未干，侵略者就纷纷鼓帆而来，进逼广州，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

参加这次斗争的民众数以十万计。他们主要通过“社学”这种传统机构组织起来，其中的成员包括农民、泥水工、木工以及起草《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的钱江、何大庚这类士绅生员。佛山、石龙二镇的棉花、棉纱、布匹等行业的商董和外省在穗的“客商”，都支持、参加了这一正义斗争。实际上，屏障广州的四乡村落，也都结成了守望相助的铁壁铜墙。这些完

①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297 页。

全可以从一则“十七乡公启”中窥斑见豹。这则公启写道

> 尝闻华夷不可杂处，彼此乃能相安。近来夷狄猖狂，每每到处寻衅，或挟带鸟枪入村，打雀为名，遇见鸡犬猪牛，则辄为放枪打毙，以示其手法巧妙；遇见妇人孩子，则或调戏，或恐吓以取笑；遇见花果菜禾，则或偷取或残害，以纵其暴戾之性，种种不法，难以尽说。兼之，当其行凶之际，若有人从旁劝阻，与之争论，必然被其突用鸟枪击毙。如此不近人情之夷狄，倘再仍前入村扰害，我等各乡，务必踊跃，将他杀死，并焚灭其尸，以警后来也。①

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侵略者的劣迹是如何从反面刺激民众凝聚起来与之相抗的,也不难理解代表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居有侵华首功的璞鼎查，及其后任德庇时、文翰等人，都不能轻易取得进入广州城的新“胜利”的原因。应该说，广州的“反入城”斗争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继续，二者异曲而同工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凝聚、自卫的能力，只是后者较前者的力度更大而已。

诚然，“反入城”斗争显示了比三元里抗英斗争更大的凝聚力，但是由此认为伴随着殖民主义者的步步入侵，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取直线上升的势态，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这是因为，在外患渐深的情况下，存在于民族内部的离散力也以前所未有的势态恶性膨胀起来。买办、汉奸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就

① 〔日〕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F. O. 230/73, 1846 NO. 12。

是一个典型的明证。这种恶势力不仅存在于官方，而且也存在于民间。在“反入城”斗争中，沙螺、西朗两堡的义民，就曾这样斥责为害一方的汉奸：

> 前者，逆夷滋扰，附近地方，皆受其害，实因内地奸人，贪钱引导所致，诚堪切齿。……（敝处）万有宽和通事馆蔡老六，为夷人主使，出面购买堡内寺岸村安姓围地十六亩余，及芳村埠叶姓围、高沙围、鹅潭一带海旁，以建立夷馆。……（故蔡老六等）是通省之汉贼，为万世之罪人。两堡士庶，固不肯坐视，亦人人得而诛之。①

另一方匿名揭帖更是痛快淋漓地直指广州地方的那些投降和具有买办化倾向的官员：

> 若要享太平，先杀藩仕成，选定弓箭手，埋伏射耆英，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广东多扰乱，总系这龟精，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倘欲除番狗，不离社学丁，义勇齐心力，尽忠答天庭，踊跃向前进，万古标姓名。②

以上两个文件所披露的蔡老六之类“奸人”和耆英之类投

① 〔日〕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F. O. 230/73，1846 NO. 54。

② 〔日〕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F. O. 233/183，1847 NO. 57。其中的“黄烟筒”系指当时的广东巡抚黄恩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降、买办化官员，显然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冲击中泛上水面的民族离散分子。他们或媚外欺内，或惧外压内，具有与民族凝聚力对垒的性质。尽管他们能量有限，但毕竟借助西方列强的奥援开始恶性地膨胀起来。这种现象就中华民族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早在孙中山问世以前，中华民族凝聚力即已遭遇到空前严重的挑战。

二、19世纪50～90年代中华民族“离散”危机的加深

从1866年孙中山诞生,到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属于上一个世纪最后的30余年。它既是孙中山问世、成长并向“而立之年”过渡的重要阶段，也是前此的资本主义列强向帝国主义演变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各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①

当时的远东地区，是各列强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中国是亚洲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也就更成为侵略者觊觎的对象。各列强侵华的基本方略是，夺占中国的周边邻邦，并以此为跳板把侵略的矛头直指中国边疆。正因为此，中国的东南、西南、西北地区，普遍爆发了边疆危机。中国的边疆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这些地区是否安定，直接牵涉到全中华民族的凝聚状况。所以，无论如何估计，列强侵染中国边疆，都是他们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凝聚团结的新招。

在边疆危机中，西北是首当其冲之区。就在沙俄趁火打劫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鲸吞中国西北领土前后，新疆内部的形势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864年，新疆回、维吾尔等族人民不堪忍受清政府的压迫，纷纷举行起义。然而，一些宗教和其他上层分子很快窃取了领导权，并建立了若干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机带兵入侵南疆，并于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汗国，自称为汗。不言而喻，阿古柏政权完全是彻头彻尾离散中华民族的非法政权。但是，俄、英两国却如获至宝，都迫不及待地要把阿古柏政权变为自己分裂新疆的工具。就在哲德沙尔汗国建立之初，沙俄为了“把喀什噶尔完全置于俄国人的控制之下”，曾要求阿古柏同意“修筑一座横跨纳伦河的桥梁和一条通过进入喀什噶尔的军用公路”。[①] 1872年6月2日，沙俄竟无视中国主权，公然和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承认其为“哲德沙尔元首”。以后又发展到源源不断地向阿古柏军队提供武器。在阿古柏政权行将垮台之时，沙俄仍不甘心放弃将中、俄疆界“从纳喇特岭移到达兰达板”。[②]

英国起步稍慢，但不甘人后。1868年12月，英印政府派出了富商沙敖到喀什噶尔“访问”。1873年更明目张胆地任命莽赛斯为全权代表，携带维多利亚女王的亲笔信前往喀什噶尔。翌年2月，英国与阿古柏签订了商约，承认阿古柏为“艾米尔”（意即统治者）。就在这年，英国又送给阿古柏1万支步枪和若干门大炮，从军事上支持他分裂中国的领土。就这样，阿古柏成了地地道道的俄、英分化中华民族的罪恶工具。

伴随着俄、英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大肆侵犯，地处东南海疆

① 〔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伦敦1878年版，第178页。

②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圣彼得堡1890年版，第577页。

的台湾又遭到日、美两国的联合进攻。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岛、彭佳岛及其他 100 多个岛屿，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是高山族人民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台湾经过高山族人民与大陆来的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长期融合和共同努力，早已成为富庶美丽的宝岛，加上其屏障东南，地处要冲，因而日、美两国无不对之垂涎欲滴。

1867 年，美国借口一艘美国船只在台湾失事，水手被高山族群众作为海盗打死一事，小题大作，出动两艘军舰和 180 余人，在台湾的琅峤（今恒春）登陆，侵犯台湾。结果遭到高山族人民迎头痛击，大败而归。但是，美国并未就此收敛侵台野心,而是变换手法,图谋采取‘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办法来从中渔利，日本遂被美国选为侵台的小伙伴。日本是通过 1868 年明治维新那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步向资本主义之路的，国内封建残余仍严重地存在，加之其时适逢世界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过渡，所以，它急速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极富侵略性。这也是它乐于与美国携手甘愿充当侵台马前卒的原因。

1871 年，琉球一渔船遇飓风漂到台湾，渔民被高山族群众误杀。本来，琉球是个与清朝保有宗藩关系的岛国。1663 年，清帝曾两次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即刻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直至 19 世纪 60 年代，琉球始终承认是清朝的藩属，并和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事起之后，本来应当由琉球与清廷协商处理后事，与他国无涉。但是，日本借事生风，无理纠缠，并于 1874 年在美国怂恿下出兵数千，侵犯台湾，进占琅峤、龟山、牡丹社、卑南社等地。日军中将西乡从道甚至扬言所占之地均非中国领土。虽然日军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其力量也远逊于陆续赴台的近万名清军，但清廷

腐败无能，不敢御敌，决计屈服，并在当年 10月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①] 这个条约虽未给日本多大的权益，但承认日本的所谓“保民义举”，就等于承认了琉球为日本属国，这就为日本瓦解清廷和琉球的宗藩关系和吞并琉球埋下了伏笔。更有甚者，日本侵台非但未得到应有的惩罚，还获取了 50 万两白银的赔款。这不仅助长了日、美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侵台野心，也助长了他们割断台湾高山族人民与大陆各兄弟民族联系的图谋。后来，日本正是通过甲午战争，实现了其置台湾在自己殖民统治之下的野心。

西南地区的危机，集中表现为英国图滇和英、俄窥藏。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与缅甸密迩毗邻。英国自1852年占领缅甸后，就急于以此为基地向中国的西南扩张。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武装“探路队” 200多人，从缅甸出发侵入云南。驻华英公使馆为配合这次侵略行动，派译员马嘉里从云南入缅甸接应。次年 2月，“探路队”行至云南境内腾越（今腾冲），遭到了景颇等族人民的英勇狙击，马嘉里被击毙，“探路队”亦被逐回缅甸。事后，英国借此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的侵略要求，并在 1876 年胁迫清廷签订了《烟台条约》。该约规定：中国须派大员到英国道歉，[②] 允许英国派员到云南调查贸易，英国可以派人从北京出发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43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47 页。1877 年郭嵩焘执行了这项屈辱的使命

等处为商埠,等等。《烟台条约》的后果极其严重,它不仅使中国西南疆域门户渐开，而且为列强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腹地提供了方便，使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维系西南各兄弟民族凝聚力变得日益困难。无怪一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它的“重要程度仅次于一八四二年和一八五八年的条约”。①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利用有关条款，很快把侵略触角伸入了西藏。在 1879 年至 1882 年间，两次派人潜往西藏，目的在于利用锡金和扎什伦布寺的宗教关系，拉拢反动上层，大搞分裂活动。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里是藏、门巴、珞巴、回、汉等各族人民世代居住之地，所以，英国分裂西藏的图谋，也就是赤裸裸地分裂中华民族的行径。1886年，英印政府殖民官员马科蕾又组织了一个所谓“商务代表团”入藏，结果为藏民所阻，无功而返。于是，侵略者气急败坏，公然发动对西藏的武装进攻。 1888 年 3月，英国侵略军突然向守卫隆吐山的西藏地方驻军发动进攻，正式挑起了武装侵藏战争，随后连连得手，进占纳汤、亚东、咱利等地。在投降主义路线左右下，清廷非但没有组织有效的反击，反而派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于 1890 年和 1893 年，分别签订了向英国求和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从而使英国侵占了中国西藏的部分领土，攫取了在中国西藏通商等许多特权。

俄国侵藏的来势虽稍逊英国，但是手段卑劣，机诈百出。他一方面打着“科学探险队”、“调查团”的幌子，多次派出武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333 页。此两条约系指中英《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

装人员侵入西藏，曾深入到拉萨附近；另一方面又派遣特务入藏拉拢上层分子，进行分裂活动。明眼人都很清楚，“累年以来，俄人人藏者肩背相望，查勘矿山，测量地势，举动至为叵测”。①

英、俄的侵藏活动无疑在西藏激起了轩然大波，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沉渣泛起，投靠外敌，逐渐演化成为以达赖喇嘛为头子的西藏分裂集团，并且不断释放出不容忽视的有害于中华民族凝聚的离散力。

如果说这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倒行逆施尚属于小打小闹的话，那么，他们挑起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役，则是侵犯、离散中华民族的大动作了。

法国是在侵占中国的近邻越南之后，进而挑起战争的。还在侵略者把魔爪伸向越南与中国接壤的北圻地区之前，法国当时驻海防的领事土尔克就强调：“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军事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② 为了找到从越南直人中国腹地的捷径，法国先后派出了所谓“调查团”和法商堵布益潜入中国云南边疆地区。因而，中法战争反映出法国兼取中国边疆和腹地的双重阴谋。

然而，1883～1885 年的这场战争，并未出现侵略者预期的结果。从军事上说，法国海军较清朝水师稍强一着，但陆军却成为刘永福、冯子材等中国抗法英雄的手下败师。不过，让侵略者侥幸的是，由于清廷丧失了起码的自信心，唯恐“兵连祸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5 卷，天津大公报社 1932 年版，第 346～348 页。

② 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